

应变与思变：元代至今独龙族文化变迁的历史人类学解读

——基于查尔斯·泰勒文化的现代性理论视角

俞志飞

保山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

摘要：独龙族自元代开始，其居住在独龙河谷两岸，受到其特殊地理、人文与生态因素影响，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。作为我国“直过”、人口较少与跨境民族，独龙族受到了党组织与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。本文在深入分析学术资料基础上，结合历史考证，民族学研究成果与实地调查等，划分四个阶段分析独龙族文化，并进行历史人类学解读，从查尔斯·泰勒文化角度开展分析，所得结论仅供参考。

关键词：查尔斯·泰勒文化；应变思变；独龙族；文化变迁；人类学解读

本文结合实地调查资料，仔细梳理学术，站在查尔斯·泰勒文化视角，叙述历史学，考证民族学成果^[1]。对独龙族文化从古至今 700 多年的变动进行解读。主要从四个阶段进行分析，探寻不同时期的文化变迁，报道如下：

1. 元明清：初民社会、封闭而居

此阶段虽说历史资料描述比较粗略，但是文字所述的社会封闭，且进程缓慢，可推知变迁来自外源性动力，比如：中央政治权利更迭、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迁等。

1.1 以氏族作为主体，封闭而居

独龙族传统文化形式形成本身是漫长的过程，经历了采集—狩猎经济、刀耕火种、手雷等，赋予其封闭、自足特质，从不同年间史料可对百余独龙族社会、经济与文化变化做出判断。自清代开始，汉文化与傣人、周边少数民族存在一定程度交流，在土司制度建设滞后，外界经济交往逐步增加，并将原有氏族社会作为主体，封闭且缓慢的经历着王朝的更替。

1.2 受各方压迫，历史意识模糊

自我认知内，存在着异方知求同理念。民族意识形成也是如此，正如梁启超所说：“何谓民族意识，谓对他而自觉为我”^[2]，只有在与族群文化交流内感受差异，才可形成“我族”概念。清代之前，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，独龙族为长期封闭而居，与外界交流、互动较少。形成本地区为中心的族群理念，仅知晓本族，未能分析他族，族群意识较为薄弱，民族性格内向，且民族性格羞涩。雍正年间，清政府在独龙江地区建设了土司制，藏族土司势力、藏传佛教势力不断增强，独龙人受到重重阶级压迫、残酷掠夺，在怒族、傈僳族长期交往内，弊端显现，惧怕周围少数民族，导致民族意识从本族中心论朝着汉族、藏族中心论过度，民族意识与主题发展医院逐步减弱^[3]。

2. 清末至建国初期：民族三交、国家认同

独龙族在近代民族交往内，长时间处于劣势，此阶段民族自决意识较弱，就政权更迭、市场变化与民族交往往往处于被动阶段，文化特征最为突出的表现在于国家认同增

强，变迁以外源性动力为主，集中为贸易、市场经济因素。

2.1 民俗未移，基督教开始传入独龙江

此时独龙族民俗文化与传统傣人所记载的基本相同，比如：“以男只穿左耳一孔，女则每耳穿三孔。带钢丝圈。”^[4]可见从清末到民国，独龙族社会保持着完成的文化元素，信仰文化上依旧以本土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为主。1935 年，美籍传教士莫尔斯多次往返独龙江地区，之后独龙族开始皈依基督教。

2.2 市场贸易促进了文化交融

传教士进入到独龙江之后，带领当地人修路搭桥。这在一定程度上，改善了当地的交通条件。伴随着山外贸易量的增加，使得山内商品流动性增强，独龙人借助马帮进入到贸易市场。市场贸易范围更加广泛，且市场交易愈发频繁。独龙江流域内，加速了主流文化、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，促进了各个少数民族，比如独龙、怒、藏、傈僳、白、纳西之间的沟通交流，这也是独龙族近代文化内的主要构成部分。

2.3 国家认同意识增强

《云南北界勘查记》写道：“（傣人）又云：‘此地本归天朝管，我们系天朝种，有我祖宗遗传之言’云云”^[5]，在建设土司制度后，随着中央王朝势力的深入，独龙江区域汉人数量不断增加。本土与外界交往、沟通、交流也不断增加，虽说民族心理处于性质懦弱，在与周边民族交往内仍受到压迫。但此时独龙族人已经形成了“大一统”国家观念，自民国开始便有了“天朝”、“中国”概念，形成了国家归属感，国家认同意识不断增强，此阶段独龙族思想变化较为突出。

3. 新中国成立后至 20 世纪末：“直接过渡”、民族认同

学术界大多数挂念认为，新中国成立之后“直过”前独龙族原始社会末期，父系家庭逐步濒临解体，并朝着原始农村公社过度。只有从原始社会迈入社会主义社会，实现了社会形势的多段跳跃。政治制度改革是这一阶段文化变迁的

外源性动力,生产例的发展、关系变化会导致文化结构变化。

3.1 具时间上的迅速性

忽略原始社会 100 多万年不计,我国经过氏族制、氏族封建制、宗法封建制、春秋战国。我国在地主封建制过度上,经历了 1600 多年,从清代结束封建统治。截止 1956 年已经完成了三大改造,从新民主主义社会正式朝着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过度。结合马克思社会发展阶段理论,独龙族经历了原始、奴隶、封建、新民主主义、社会主义社会,从古至今经历了 5000 多年。纵观独龙族历史发展进程,从 1954 山区改造朝着 1958 年建立护理组转变,从刀耕火种朝着犁耕农业转变,从个体私有朝着互助合作转变,独龙族从原始社会末期朝着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仅经历了 5 年时间。

3.2 民族认同感增强,由应变向思变过渡

新中国成立之前,一直遭受着压迫与歧视。少数民族隐瞒、更改族称,使得民族成分模糊不清。新中国成立之后,我国制定了民族平等政策,旨在确保少数民族当家做主权利,为少数民族公开正名。

第二次人口普查之后,我国民族识别进入第二阶段,经周恩来总理确定,将独龙族纳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,翻开了民族发展的新篇章。族称确定增强了独龙族人对于民族概念的认同感与自豪感。改革开放之后,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,现代技术的引入,高山峡谷内的独龙社会逐步开放,也开始融入现代生活。独龙族群众更加了解物质生活与科技信息,发展自我要求、自觉意识也逐步清晰。虽说受到社会发育不全、自生能力不足等限制,依旧处于被动应变状态,但想要跟上时代发展角度的想法愈发强烈,发展思维也从被动朝着主动转变。

3.3 地处偏远交通受限,受主流文化冲击较小

新中国成立前,独龙族群众进出需要经历半个月左右,新中国成立之后,即便是走“人马驿道”来回也要经历 6-7 天。到 1999 年,公路贯通后进城也要 7-8h,交通限制使得独龙族发展受限。

就传统文化主题研究内,不少学者介绍了独龙族的原始自然历法,展现独龙族饮食文化、记述独龙人命名方法和姓名特点等。

4. 21 世纪初至今:现代转型、思变跨越

结合文献研究,依照调查数据得知,随着外部信息社会的高速发展,独龙族再次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,新的时间节点上,物质社会剧变,使得信息、思想与文化产生变革。

4.1 过程激烈

步入 21 世纪之后,独龙族的贫困受到了党与政府的重视。自启动扶贫攻坚以来,全乡内 6 个村均实现了通电与通车,有了电话与电视,饮水也到了安全标准,并成立了金融服务网点。建设了 1015 户安居房,全乡安居房入住总计 1068 户,人均住房面积增加显著。彻底改变了独龙族入学难、就医难、老无所养的状况。

4.2 普遍“思变”

政府部门加大了对独龙族的帮扶,促使村民具备变的能力,素质扶贫培训人数总计 25464 人次,包含:烹饪、汽修、编织、驾驶、种植等。

4.3 传播渠道改变,传统文化元素逐渐消失

2017 年全乡开通了 4G 网络,独龙族人几乎人手一部手机,杜绝了信息孤岛。同年,独龙江隧道与公路贯通,完成了溜索改桥,只需 3h 就可到达县城。传播手段与交通公共基础设施改善,将独龙族原本生存、生态改善,独龙族人下山定居后,使得原本的生活生产方式改变,导致传统文化元素迅速凋亡。

结束语

综上所述,纵观丰富文献资料,开展理性思考,就封闭小型社会而言,文化变迁属于贯穿始终的主线,历史变迁动力不仅仅在于生产方式,还在于文化与观念。族群文化转变来自自然生态、其他族接触或政治制度等要素,一般内外影响较小。基于上述研究可得知,不同时期独龙族的文化差异较大,发展至今可见明显的变迁与完善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武沐,张敏.过渡时代:对社会文化变迁的反思——以云南贡山独龙族为例[J].青海民族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20,46(02):1-6.
- [2] 杨艳.云南贡山独龙江乡的扶贫与发展研究[D].中南民族大学,2018.
- [3] 杨艳.应变与思变:元代至今独龙族文化变迁的历史人类学解读——基于查尔斯·泰勒文化的现代性理论视角[J].青海民族研究,2017,28(03):102-107.
- [4] 桑坤.独龙族传统通婚圈的当代变迁[D].云南大学,2017.
- [5] 李思齐.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独龙族教育变迁研究[D].中央民族大学,2015.